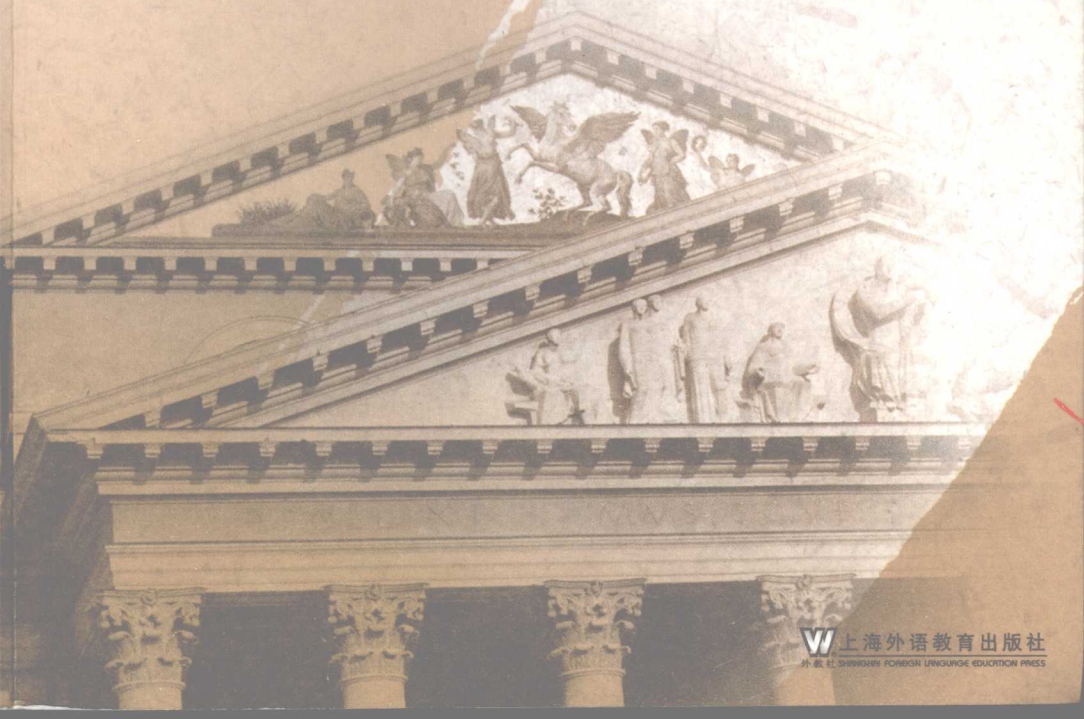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中德文学因缘

BEITRÄGE ZU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吴晓樵 著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中德文学因缘

BEITRÄGE ZU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吴晓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文学因缘 / 吴晓樵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446-0868-8

I. 中… II. 吴…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德国 IV. I206 I51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40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89×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版 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868-8 / H · 0374
定 价: 2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
陈洪捷 北京大学
范捷平 浙江大学
李明辉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麦劲生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孙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卫茂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武能 四川大学
叶 隼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刚 清华大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Adrian Hsia 夏瑞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Françoise Kreissler 何弗兹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Iwo Amelung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Joël Thoraval 杜瑞乐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Klaus Mühlhahn 余凯思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Michael Lackner 郎密榭 德国埃尔郎根大学

中德文化丛书



总序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

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另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阈（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述）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

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照示者也。”这不仅是 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

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阈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之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为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外教社）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内容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叶 隽

2007 年 4 月 27 日至 12 月 22 日间

陆续作于巴黎—布达佩斯—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

扑朔迷离百余年的“歌德与《百美新咏》”研究 ——纪念歌德逝世 170 周年兼谈新版德文《歌德全集》的一处失误 ·····	3
席勒与《好逑传》·····	10
海涅与两位中国学者·····	13
冯塔纳关注叶名琛·····	18
施尼茨勒的中国小说残稿《义和拳》·····	21
霍夫曼斯塔尔钟情于中国文化·····	25
穆齐尔的中国签证·····	28
沙米索、克拉普罗特与孔夫子的格言·····	30
德国汉学家翻译《忠经》·····	33
德国汉学家洪涛生及有关他的研究·····	35
德国诗人争相歌咏李白·····	38
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	41

辜鸿铭与歌德	47
马君武译席勒《威廉·退尔》的初刊时间	50
阿恩特:王韬译《祖国歌》的原作者	56
荷尔德林早期的中国知音	61
鲁迅的海涅译诗及其他	64
胡适与海涅名诗《松》	69
“领略那心声的幽远” ——邓均吾的海涅译诗	72
青主与海涅兼及他对德语文学的翻译	75
“尼采在中国”接受研究的新收获	79
苏德曼与中国文坛	82
德国通俗文学家卡尔·迈的作品的早期中译	87
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	90
被忘却的维也纳相会	94
阿图尔·施尼茨勒的意义	98
基希的《秘密的中国》	101
《炭坑夫》的作者路·米尔顿夫人与中国左联	104
安娜·西格斯与中国	108
鲁迅与鲁特·维尔纳	114
1981年莱比锡德文版鲁迅选集《写于深夜里》的导言	117
茨威格在中国 ——从《罗曼·罗兰》的早期中译谈起	120
茨威格与罗曼·罗兰	120
《罗曼·罗兰》的译介	122
《小说月报》对茨威格的介绍	123
《莽原》译载《罗曼·罗兰传》	126
杨人梗译《罗曼·罗兰》	128
《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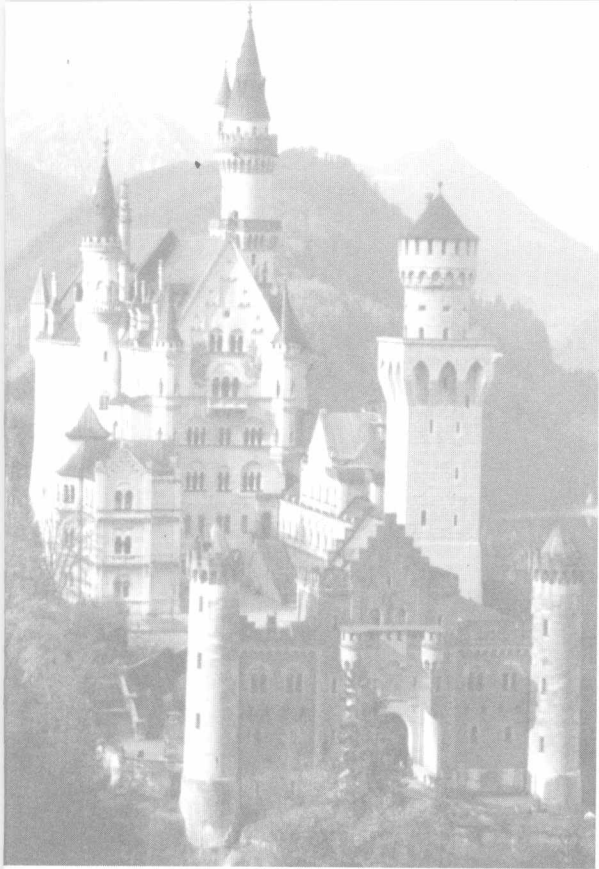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民国时期的中译	133
《马来狂人》与茨威格其他作品在民国时期的译介	140
郁达夫的德语文学之梦	150
徐志摩对德语文学的借用	
——兼及他的歌德与尼采译诗	154

第三辑 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

“五四”后任教北京大学的德文洋教习欧尔克	161
对民国时期留德学人的强光聚焦	
——叶隽著《另一种西学》读后	169
张威廉与中国德语文学的译介	174
近百年来中国德语语言文学学者海外博士	
论文知见录(1911—2008)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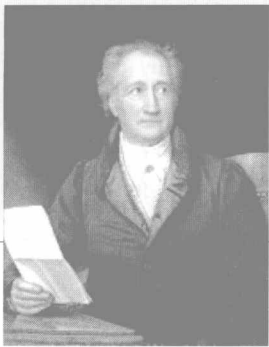
第四辑 杂 篇

苏虎克与克莱斯特	201
收藏家瓦尔特·本雅明	205
改变欧洲文明进程的谷腾堡	208
外文与译名:关于现代文献的校勘	211
重温《达豪之歌》	
——纪念奥地利反法西斯作家尤拉·佐伊费尔	213
《神曲》早期流传中国小考	216
说书人凯伦·布里克森	219
陈季同著作德译本	224
“文评教皇”眼中的德国经典长篇	226
人名索引	229
后 记	239



第一辑

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



扑朔迷离百余年的 “歌德与《百美新咏》”研究

——纪念歌德逝世 170 周年兼谈
新版德文《歌德全集》的一处失误

1827年2月初,身处魏玛的德国大文豪歌德,根据英国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的中国诗体小说《花笺记》英译本所附的《百美图咏》,翻译了四首有关中国古代美人薛瑶英、梅妃、冯小怜和开元宫人的诗和事略。像汤姆斯英译文一样,歌德在译诗前的小引中,介绍了诗前小传及诗歌的来源是《百美新咏》。在汤姆斯的英文本中,接着介绍的是版本:“原书在乾隆三十二年出版”,而歌德在翻译中删除了这个版本信息,改为:“使我们相信,尽管有着种种的限制,在这个奇特古怪的帝国里还是一直可以生活、恋爱和吟咏的。”歌德这种处理文本的态度,给后来的全集编撰者和歌德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人们不知该把晚年歌德与中国文学的亲密接触的成果归之为翻译,还是算作改作。

像歌德 1827 年稍后创作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组诗一样,他翻译的《百美新咏》中的四首中国诗,也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自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沃尔德马·冯·彼得曼(Gustav Woldemar von Biedermann)在其《歌德研究》(*Goethe-Forschungen*)中开始注意到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以后,100 多年来中外研究界就对这一有意义的课题作了不倦的探索。^①就是到今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不能算是完全解决。笔者通过阅读比勘中外相关的研究文献,想指出即使在“歌德与《百美新咏》”这一个比较狭小的研究领域也有学者们尚需努力的地方。为纪念歌德逝世 170 周年,谈点看法,庶几对中外研究界有所启迪,不妥之处,也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歌德在其一生的不同时期对中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注。本文特限定在翻译《百美新咏》中的中国美人诗的晚年的歌德。

1827 年,是老年歌德对中国一往情深的一年。他阅读翻译为法文的中国小说《玉娇梨》,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译成,标题为 *J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1826 年 12 月 23 日出版的法国《环球报》(*Le Globe*)详细介绍了雷慕沙的这部译作。雷慕沙的翻译当时在魏玛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歌德也注意到这部小说,因为《环球报》也是他经常阅读的一种报刊。

歌德从事中国诗的翻译在他当时的日记、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以及同时代的相关文献中有较详细的记载。1827 年 1 月 29 日,歌德特地从魏玛宫廷图书馆借出 1824 年汤姆斯在伦敦和澳门翻译出版的《花笺记》英译本,标题为《中国人的求爱》(*Chinese Courtship*)。歌德在日记里把标题译作 *Chinesische Werbschaft* 或 *Chinesische Werbung*,意为《中国人的求爱》。汤姆斯的英译本歌德直到 6 月 14 日才归还。1 月 31 日,歌德在日记里记录,曾和爱克曼讨论“关于中国诗的性质”。2 月 2 日又在日记里记载,“研究中国的诗”。2 月 3 日歌德日记:“晚上自习,继续读《中国人的求爱》。”5 日口授,晚上继之。6 日开始抄写,9 日誊写清稿,准备投稿《论艺术与古

^① Richard Wilhelm: 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 Kultur. In: *Jahrbuch des Freien Deutschen Hochstifts* 1927, S. 301—316. 又如林笳:《歌德与〈百美新咏〉——跨文化阐释的一个尝试》,载桂林《东方丛刊》2000 年第 1 期,第 109—124 页。

代》杂志,10日寄出,11日歌德向爱克曼朗读他翻译的中国诗。28日《论艺术与古代》杂志寄来校对清样,3月3日歌德寄回校对清样。

1827年,这四首译诗以《中国之事》为题发表于《论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1册第159至163页。

1933年,我国学者陈铨在德国基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中也考察了歌德的中国译诗。^①他注意到汤姆斯的英译原文,查看了歌德利用的1824年英文版《花笺记》中的译诗,但是陈铨没有能够核实汤姆斯在文中声明利用的“乾隆三十二年版”(1762)中文本《百美新咏》,因此在德文博士论文里他只是提到其中《梅妃》这一首诗的中文原作,而且依据的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研究。归国后,陈铨在根据博士论文略作修改、于1936年出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德文学研究》一书里,也没有继续这一工作,查考汉语原文,依然只给出了《梅妃》一诗的汉文原作。其实,陈铨并不清楚或也无意于查考歌德翻译的另外几首诗的汉文原作。

此外,在《中德文学研究》中,陈铨未能提及歌德在《开元》一诗最后自己兴之所至附加的两行“续诗”(读者可以翻阅近年来《中德文学研究》的重排本。^②但该重排本错漏很多,校对不精,诚可惜也)。

就是陈铨德文博士论文也有引文错误这个问题。如所引汤姆斯《薛瑶英》英文翻译中的最后两行(见博士论文第77页,《中德文学研究》重排本第93页)为:

Wir are certain, that the Emperor Woo of Han dynasty,
erected a screen lest the wind should waft the fair Fe-lin.

实际上1824年原本为:

Wir are now certain, that the Emperor Woo of Han dynasty,
Erected a screen lest the wind should waft away the fair Fe-lin.

① Chuan Chen: *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Diss. Kiel 1933, S. 76—80.

②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世纪万有文库)。